歷史塵封中閃耀光芒的唐廷樞

·環境、教育與早期實踐之影響·

□ 胡海建*

唐廷樞（1832-1892）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買辦、實業家和晚清洋務官員，集官紳商於一體。

一、“中國可以沒有李鴻章，不能沒有唐廷樞！”

1873-1892年的二十年，唐廷樞在近代航運業、保險、鋼鐵、水泥、煤炭、冶金、鐵路、軍事、能源、電報、農業、畜牧、煤氣、外貿和近代外交領域都活躍着他的身影，並頗有建樹。他為中國的近代化奔走呼號，嘔心瀝血，直到染病逝世。他是中國近代化運動的推動者、參與者、實踐者；是近代工業文明的傳播者、宣傳者；還是近代東西文明的橋梁，他將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科學文明與東方文化集結交匯。唐廷樞是中國近代化運動的集大成者。“他（唐廷樞）是中國第一位現代買辦。今天，唐景星已被英國幾乎全部忘卻，但是他也許是中國近代歷史中最受人注目的、有買辦身份的人。他是中國第一個現代買辦。所謂現代，其意義是他經營了工業革命時代的產品——如蒸汽機輪船，以蒸汽為動力的開礦設備和鐵路等。在於他成功地組織商業資本列入合營公司，向公司發行股票。他是中國輪船招商局漫長歷史最初十年中的‘動力’；他是華北唐山附近開平煤礦的奠基者，管理該礦直至他1892年逝世為止。以後招商局與開平煤礦都幾經變遷，儘管如此，在唐氏的經營期間，兩者都是非常成功的。應該感激，在李鴻章的意願保護下，他得以在政府控制的架構下繼續發展。雖然唐氏在逝世時相對來說並不富有，但他的經歷，表現了一種有控制的冒險與善於隨機應變的傾向，他一方面能夠把中國商人與中國政府的資源或財力結合起來，另一方面也摻和了歐洲人與美國人的實際知識。他既愛國，又着眼於世界。”(1)難怪李鴻章說：“中國可以沒有李鴻章，不能沒有唐廷樞！”

二、“唐景星（唐廷樞）的出色事蹟，即使是在任何國家，也夠資格被稱為一名現代勇敢的創業者！”

唐廷樞是晚清貧苦農民的兒子，卻成為中國近代最早的留學生之一，與中國第一位留美博士容閎同為馬禮遜學校的第一批學生，這卻得益於農民父親的驚人之舉。他是一個一文不名的窮學生，卻成為中國近代傑出的工商業者，創造了數以千萬計的工業利潤和商業利潤。他靠的是知識，靠的是國家，靠的是開明政治人材。

唐廷樞在中國近代化的過程中是一位勇敢的探索者，開拓者，創造者，他在中國近代留下了多個第一：

1842年，入香港馬禮遜學校讀書，成為中國近代最早的留學生之一；

1862年，由廣州經緯堂出版了由他所著的中國第一部《英譯集全》；

1873年，改組輪船招商局，創立中國近代第一個國有股份制企業；

1876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家保險公司——仁和水險公司；

1877年，創辦了中國內地第一家用西法開採的煤礦——開平煤礦；

*胡海建，廣州暨南大學歷史學博士、華中師範大學博士後，現任肇慶教育學院院長。

1879年，派合眾號試走檀香山、舊金山，開闢了第一條直達美國的海上航線；

1880年，開挖了中國第一條輸煤運河——蘆台至胥各莊運河；

1880年，主持建成了中國第一條自建標準距鐵路——唐胥鐵路；

1880年，使用中國第一臺蒸汽機車——“龍號”蒸汽機；

1881年，派海琛號遠航英國，開闢了第一條遠航英國的海洋航線；

1883年，開採中國第一家塞外銀礦——承平三山銀礦；

1886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個鐵路公司——開平鐵路公司；

1887年，創辦了中國第一座水泥廠——唐山細棉土廠。

所有的第一，都凝聚着唐廷樞的知識、智慧、才幹與勇氣。唐廷樞開創的開平工業基地堪稱“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搖籃”。1984年英國著名的跨國企業怡和洋行出版《薊草與翡翠：怡和洋行150週年特刊》，其中這樣評價唐廷樞：“唐景星的出色事蹟，即使是在任何國家，也夠資格被稱為一名現代勇敢的創業者。很清楚，他不僅在怡和開創他的事業，而且通過這個關係，在他所進行的有政府贊助的遠航與採礦事業中繼續得益，其中有許多方案有助於中國的現代化。這一點，在唐挑起與西方企業及其產品作競爭的愛國事業後，顯得更加正確。由此，香港的英國企業，在廣泛發展中的領先地位，引起中國越來越多的關注。英美自由貿易與沿海中國商人之間的協作與競爭，在條約規定下促進了一個時代的發展，實際上對這個農業－官僚國家的轉化，起了一定的作用。”(2)

三、實業家、教育家、政治家輩出的家庭——子侄唐國安、唐紹儀成為國家棟樑。

唐廷樞不僅自己走上實業救國之路，而且在他的影響下，兄弟子侄中也是人材輩出。其兄唐廷植(茂枝)也曾在馬禮遜學校讀書，後留學美國，回國後曾繼任怡和洋行買辦；唐廷樞籌辦開平煤礦，唐廷植努力奔走，在上海籌集股金，使開平煤礦順利開辦；他還是一位愛國者，在海外利用自己所學的知識和影響積極維護華僑的利益。其胞弟唐廷庚（應星）也曾當過上海輪船招商局上海分局經理，在光緒六年（1880）三月二十一日，被湖廣總督李翰章等奏請加三品銜。他的族兄唐國泰（翹卿）當過匯豐銀行買辦和上海茶業公所董事，開辦恆順宏茶棧。族兄弟唐瑞枝（瑞芝），當過漢口阜昌銀行買辦，開辦厚生祥茶棧。他的兒子唐玉田曾在豫北一帶從事工商業活動，卓有成效，開設公司，從事機器麵粉業，採辦直隸磁州、河南彰德兩處所產煙煤，獲利頗豐。其侄唐傑臣曾留學美國，也當過怡和洋行買辦，曾擔任上海內地自來水公司之總辦，並為廣肇公所之總董。特別是他的兒子唐介臣（國安）留美回國後曾在開平煤礦任職，並擔任過清華學堂第一任校長，成為著名的教育家。其侄唐紹儀也留學美國，後成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界人物，擔任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內閣總理，成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在袁世凱時期的“南北和談”、建立中華民國、推進中國政治民主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貢獻。

四、唐廷樞逝世，外國使館下半旗致哀。

1892年10月7日，唐廷樞在天津病故，翌日《捷報》發表沉痛的消息：“唐景星先生於昨天中午逝世，這使所有關心中國進步的人都感到哀悼。”(3) 李鴻章親自主持了公祭儀式，痛泣之曰：“要找一個人來填補他的位置是不容易的。”(4) 唐廷樞之去世，中外各界深表惋惜，各國駐津領事館在公祭日下半旗致哀；在靈柩南歸途中，有十三個國家的商務員搭乘專船護送至毗鄰澳門的唐家灣海面才離去。英國太古、怡和兩輪船公司的商船，均鳴長笛三聲，以示最後之告別。唐氏的墓地選擇在今珠海市吉大村一處山頭。“唐景星的一生，標誌着中國歷史的一個時代。他的死（……）是一個持久的損失。”(5)

唐廷樞逝世已逾百年，他所開創的近代化事業和今天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中國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現實與歷史、今天和昨天彷彿在重逢對話。我們研究唐廷樞，讓歷史塵封中的唐廷樞放射出穿越時空的光芒，也是為了完成他未了的事業，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唐廷樞生活的時代是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英、法、美等西方各國相繼在19世紀上半期完成工業革命，為了推銷其“過剩”的工業品和掠奪原料，逐漸地對東方各國進行軍事侵略和經濟掠奪。

同時，他們也在東方各國進行宗教、文化、教育活動。唐廷樞就讀的馬禮遜教會學校就是英國傳教士於1839年在中國創立的。唐廷樞出生地唐家毗鄰澳門，具有地緣優勢。唐家人在與澳門的經濟、文化、生活的各種交往中，開始朦朧地接受西方的一些先進事物，這是唐廷樞能最早接受到西方教育的重要原因。他所接受的這段教育使他畢業能後得心應手地在英人開設的巡理廳和海關從事工作。

環境對唐廷樞的影響

唐廷樞，號景星，亦作鏡心，1832年出生於廣東香山縣唐家灣（今珠海市唐家灣鎮）一貧寒之家。他於1892年10月7日在天津逝世時，是日上海《北華捷報》發表文章說：“唐廷樞的一生，標誌着中國歷史的一個時代，他的死（……）是一個持久的損失。”(6)

唐廷樞生活的時代，正是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時代。當時的中國，在清王朝的統治下，頑固地實行閉關鎖國的政策，自認為除了“大清”以外其餘都是蠻夷之邦，對西方資本主義的新事物和進步的文化緊閉大門。當時英、法、美等資本主義國家相繼完成工業革命。工業革命促進了生產力的成倍增長。為了推銷工業品，掠奪工業原料，西方列強加緊對外侵略，古老、閉關、落後的中國便成為了西方列強的侵略目標。

1839年6月3日林則徐虎門銷煙，向全世界顯示了中國人民反侵略的堅強決心。虎門銷煙的消息傳出後，英國資產階級當中掀起了一陣戰爭的狂熱。1840-1842年，英國發動了侵略中國的第一次鴉片戰爭，中英雙方先後在廣州、廈門、定海、鎮海、寧波等東南沿海激戰，中國軍民雖然英勇戰鬥，不畏犧牲，但最終因為清王朝的腐敗無能而遭到失敗。清政府相繼被迫與英、法、美簽訂喪權辱國的中英《南京條約》及附件、中法《黃埔條約》、中美《望廈條約》。根據這些條約，中國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處為通商口岸；割讓香港給英國，賠款白銀兩千萬兩，開闢租界，實行協定關稅，列強取得領事裁判權和片面最惠國待遇；外國商船、兵船自由出入中國領海，弛禁天主教等，使中國喪失領土主權。由此，中國邊疆開始出現新危機，中國的關稅權、司法權、航海權被破壞，租界成為侵略中國的據點。弛禁天主教為傳教士利用宗教侵華披上了合法外衣。從此，外國傳教士就和商品、鴉片一道源源入侵中國，成為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重要手段。

外國資本主義憑藉不平等條約，加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租界成為對華經濟侵略的據點，興辦各項企業，諸如開設行棧、設立碼頭、開設金融機構、創辦報刊、開設船塢等等，便利了外國資本家對華輸出商品和掠購原料。外國商品潮水般地湧入中國市場。“他（璞鼎查）已為他們的生意打開了一個新世界，這個世界是這樣的廣闊，傾蘭開廈全部工廠的出產也不夠供給她一省的衣料。”(7) 這使中國社會經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東南沿海地區，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開始解體。價廉物美的洋布洋紗等機器產品充斥中國市場，排斥中國的土布土紗，使中國的手工業遭受沉重打擊，從事家庭手工業的農民和從事手工業的勞動者面臨失業的危機。鴉片走私更加嚴重，白銀大量外流，銀價上漲。1844年銀一兩拆銅錢至一千七百餘文，到1850年增至二千二百餘文。銀兩愈貴，農民負擔加重，生活愈困難。更為嚴重的是使國庫空虛，政府財政危機加重。據統計從鴉片戰爭以後的二十多年，因國內戰爭支出的軍費就高達4.22億兩(8)之多。國庫的儲銀急劇下降，最低點的咸豐至同治年間僅一百餘萬兩，相當於道光年間的1/15、乾隆年間的1/45。“實銀”就更少了，大約祇有十萬餘兩，咸豐八年至同治三年甚至跌至六萬餘兩。(9)另外，50年代始清政府就不斷地舉借外債，至80年代中期，每年還本付息已佔財政總支出的3-6%。(10) 這樣，財政日益竭

蹶的清政府祇有靠借債度日，更無從談起投資創辦民間實業，但卻為近代中國新的階級關係的產生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

隨着中國社會經濟的變化，中國的階級關係也相應地發生變化。在外國資本家創辦的船塢和工廠裡，出現了受僱於外國資本家的中國工人，這就是中國最早的一批近代企業工人。同時也產生了中國早期的買辦，吳健彰、徐寶婷、徐潤、唐廷樞、唐翹卿、莫仕揚等就是早期著名買辦豪商。他們是外國資本主義入侵之後半殖民地中國的產物，成為外國資本家在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經紀人，也是清朝統治者勾結外國資本主義的媒介。

地處廣東南部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既是外國資本主義侵略的前沿，也是開風氣之先的地區。廣州、虎門、香港等地在鴉片戰爭中曾是中英雙方交戰的重要戰場，鴉片戰爭結束後，成為中國主權遭破壞最早的地區。香港割讓，領海主權、關稅權、司法權等被破壞、外國商品輸入、教會勢力滲透，珠江三角洲地區首當其衝。五口開市後，清朝的閉關政策於是解體，廣州作為唯一通商口岸，由“十三行”壟斷貿易的歷史一去不復返。在珠江三角洲地區產生了一大批為外國資本家經銷棉毛織品、鴉片等進口商貨和收購絲、茶等出口商貨的新興商人，即中國近代的買辦商人。怡和洋行的唐廷樞、唐廷植，寶順洋行的徐潤，匯豐洋行的唐翹卿，太古洋行的莫仕揚、莫藻泉、莫幹生，旗昌洋行的吳健彰等人，均出生於珠江三角洲。買辦商人在與外國資本家打交道的過程中，逐漸學習西方先進的管理知識、管理技術，學習西方語言，瞭解西方歷史地理，成為最早接受西方文明的中國人。但由於時代的局限和自身經濟利益的局限，他們還不可能達到“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境界；直到60年代後，他們才發展成為具有封建性、買辦性和民族性的洋務派。

香山唐家實為珠江三角洲南部的一處小港灣，原本是一個很荒僻的地方，鄉民們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的貧苦生活。但自澳門開埠後，這裡竟得風氣之先，其社會、經濟、文化、教育等都在不斷發生變化。

明朝末年，唐家村人開始衝破了單一農業生產而向經貿方面發展，到清朝的乾隆至道光年間，“廣州十三行”的貿易活動日趨活躍，澳門更是“商賈雲集”。香山唐家村處於澳門與廣州之間，享有地勢之優越，這裡的人們於是有機會接觸許多外國的新鮮事物，有一部分人不再種田而是外出經商販運去了。《子英房譜》記載廣禮房[11]的十六世祖士功“赴瓊南種植檳榔，獲利甚豐”[12]；廣禮房唐逸才道光末年（1850）“客港澳經商，家稱小康，獲翠微吳建章觀察代捐中議大夫恩賜修職佐朗（九品）”[13]；廣禮房唐棣華“少有遠志，道光中，挾資本營業洲，創合隆雜貨店，往來梅錄之間，囊篋充盈”[14]。可見唐家村人早在17世紀就因地理位置的優越，視野漸開，傳統的重農抑商思想開始改變，單一的傳統農業經濟已受到來自外部和內部的衝擊。唐家人開始往來於港澳、海南、內地經商販運，獲利較豐，到鴉片戰爭前夕，這種勢頭更猛，開始出現了積蓄豐厚的富商鉅賈，經營範圍也由港澳擴展到內地福建、上海、漢口、廣州。道光七年（1827）梁尚舉撰寫的〈重修三（間）廟碑文〉記載：“唯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重修後，風俗敦龐，人心厚懿，士氣騰茂，農穀豐登，商賈往來之繁，魚鹽居積之富，迨有過之而無不及。”[15]隨着鄉外出經商活動的頻繁，商品經濟日益活躍，農產品、手工業產品轉為商品的速度加快，這不僅促進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也加速了商貿往來的頻繁。特別是在進行商品經濟的過程中出現了一批富商鉅賈，他們除了樂善好施捐獻鄉里外，還積極參加近代經濟建設，積極創辦民族工業。

隨着單一農業經濟的突破、商貿的頻繁，人們的眼界開闊了，思維方式開始發生了變化。香山唐家人開始離開家鄉，到上海、廣州、港澳，甚至東南亞、美洲去開闢新事業。這不是簡單的背井離鄉漂洋過海，而是在新事物、新經濟影響之下人們思想的一次解放。

咸豐五年（1855）唐步瀛寫的《金山埠記》載：“道光二十八年（1848），有花旗夷人載貨趁諸國，中途遇風漂至一山，杳不識其名，偶登彼汲水，見

坑邊毫光閃鑠與砂礫雜處，夷人詫曰：此黃金也！（……）到山開埠，即金山。（……）由是傳播中華。”(16) 這實際上就是記載舊金山發現黃金的過程及舊金山開埠和對中國的影響。北美舊金山發現黃金後，許多有一定商品思想基礎的中國人就加入到美國的“淘金熱”中去了。“道光二十九年（1849），有侄由上海回家，告余曰，欲往金山，（……）遂於四月與數人同往，（……）果有大獲。由香港揚帆一路向東，過日本國後，由東轉北，海天湏洞，上下一色，七十餘日到埠。（……）廿九、三十年間，掘金多為夷人，唐人僅數百人。（……）咸豐六年（1851）後，唐人源源而來，即如我都，大鄉六七百人，小鄉二三百人，他如外縣外府更難僕數。”(17) 從道光二十九年（1849）美國舊金山發現金礦到咸豐六年，唐家村由數人到數百人去美國舊金山開礦，說明漂洋過海開發新事業不祇是少數人的行動，而是帶有普遍性的群眾自發活動。在這種自發的勞力輸出現象之中，香山縣特別是毗鄰澳門前沿的唐家灣實則已走在中國的前沿。在這些人中，有的“大行其志，則業豐盈，乃納粟得官”(18)；有的“獲利大豐”，捐獻鄉里；有的則定居“金山”，成為華僑，這些人經濟地位的變化對文化教育的要求也就相應地發生了變化，他們對自己子女的教育內容、教育形式的要求與期望值也發生了很明顯的變化。

唐家灣自澳門開埠以來，經濟結構開始發生變化，在從事商貿的經濟活動中產生了一批富商大賈。人們的行為方式明顯發生了變化，敢於遠離家鄉，遠離祖國，鋌而走險，遠去美國舊金山淘金。在經濟活動和行為方式變化的過程中，社會風氣、教育理念也發生了變化，唐家灣人樂於樸素地接受西方先進事物，尤其是教育方式的變化，成為殷商富戶的“唐家人”紛紛送子弟出洋留學或者去大城市的“洋學堂”讀書，不僅是“淘金”暴發者有意栽培他們的子弟，連貧寒之家也都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培養自己的子弟。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這樣敘述：“予生於彼多羅島（Pedro Island）之南屏鎮。鎮距澳門西南可四英里。”(19)“1834 年，倫敦婦女會在遠東倡女學，英教士古特拉富之夫人（Mrs. Gutzlaff）遂於是時蒞澳，初設一塾，傳授女生。未幾復設附塾，兼收男生。其司事某君，予同里而父執也，常為予父母道古夫人設塾授徒事。”(20) 容閎出生地距離澳門很近，祇有“四英里”，所以澳門的變化很快就影響到了他家鄉。英國教士在澳門辦學這一消息自然而然地傳到南屏鎮。當時許多中國人已經在澳門、香港從事行業不同的工作，容閎父親的朋友、唐廷樞的父親唐寶臣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在港澳看到商賈雲集，商業繁榮，統治秩序井然，瞭解到知識的重要，社會的進步，於是萌發讓自己的兒子或朋友的兒子入西式學校學習之念。“意者通商之後，所謂洋務漸趨重要，吾父母欲先著人使，冀兒子能出人頭地，得一翻譯或洋務委員之優缺乎？”(21) 容閎的父母讓容閎入讀澳門的英國教會學校，是希望兒子學到西方的知識後能成為一名翻譯或洋務委員，唐廷樞的父親也祇是想讓自己的兒子將來能成為英國人手下的一個僕人。唐廷樞、容閎就是這樣走出自己的家鄉接受西式教育的。

香山特別其所轄的現珠海地域自澳門開埠後，由於地理位置的優越，得風氣之先接受西方先進事物，經濟結構由單一農業向經貿發展，人們的思想和行為方式都在不斷變化。尤以唐家為中心的香山人氏，或則漂洋過海，或則到澳港東南亞，或則到廣州、上海、漢口等國內大城市闖世界，開闢自己的新事業。這些人在經濟地位變化、接受新事物後思維方式亦起了變化，對子弟們讀書學習的要求也發生了變化，他們需求優質的與西方接軌的現代教育。這種教育方式培養出來的人材則剛好適應近代化中國的需要，於是以唐家為中心的香山縣在近代出現了近代化的智識人材群體。

鴉片戰爭後，不平等條約簽訂，五口通商、沿海大小港口開放，外商紛至遝來尋找商機，他們需要代理人“架橋鋪路”，於是“買辦階層”就在這個特殊的時期和環境中產生，而開風氣之先的唐家灣畔一個買辦實業群體便應運而生，甚至出現了買辦世家。唐廷樞、唐廷植、唐紀常、唐傑臣兄弟叔侄三代四人擔任怡和洋行買辦長達五十年；莫仕楊、莫藻泉、莫幹生祖孫三代連任太古洋行買辦長達六

十年；徐昭珩、徐瑞珩、徐潤叔侄三人連任寶順洋行買辦長達十六年；唐瑞芝、唐朗山兄弟任漢口俄商阜昌洋行買辦長達三十年；還有寶順洋行買辦盛恆山、上海匯豐銀行買辦唐翹卿、英商香港渣打銀行總買辦容配錦、美國旗昌洋行買辦吳建彰（……）。唐家灣為整個早期的買辦階層輸送了大批骨幹力量，唐廷樞就是買辦群體中的一個重要代表。

自南宋紹興期間香山建縣以來，珠海一直屬香山縣管轄，至1953年5月，珠海始建縣治。珠海地處珠江口南海濱，毗鄰港澳，總面積僅7,555平方公里，在近代已成為一個群英薈萃之地，出現了一個近現代人材群體，其中可數之為全國“第一”的人材就很多，包括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團體興中會第一批會員鄭仲、中國華南地區第一位系統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人物楊匏安、中華全國總工會第一任委員長林偉民、歷史上時間最長的一次罷工（省港大罷工）的領導人蘇兆征、中國第一位留美博士並為首任駐美副公使容閎、中國第一批赴日留學生唐寶錕、創建中國最大百貨公司的蔡昌、最富傳奇色彩的文藝家蘇曼殊、商界王子並為中國駐檀香山首任領事陳芳（……）。這些祇是珠海人材群體中的一小部分，現在單獨論述一下被譽為“中國第一企業家”的唐廷樞。

唐廷樞接受的教育及其早年實踐

唐廷樞是馬禮遜學校最早的六名學生之一。他的入學得益於他忠厚老實的父親之明智選擇。唐廷樞在馬禮遜學校學習六年，系統而紮實地學習了地文、算術，特別是英語。他畢業後幹過拍賣行的助手，在香港英國人開設的巡理廳當過翻譯，後到上海擔任海關職員。系統而紮實的學習，為唐廷樞以後振興民族工業，打下了深厚的知識基礎；而在拍賣行、巡理廳和海關的工作，則使他熟悉了大量國際法律知識、經濟知識、各種海關法例和海關規章制度，對他今後創辦和振興民族工業，維護民族利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唐廷樞的父親唐寶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農民，他在唐家灣由農到商的歷史性轉變中，既未去淘金，亦未去經商，而是到香港馬禮遜學校布郎校長手下當名聽差，其目的祇是為了掙些錢養家餬口。其時唐寶臣家境非常貧寒，父親唐尚勳已垂垂老矣，夫人梁氏在農田勞作，而且有了四個兒子（即長子廷植、次子廷樞、三子廷庚和四子廷堅），全部生活重擔都壓在他一人肩上，光靠種田砍柴根本無法維持生計，祇好另謀生路，以撐起這個苦難之家。

香港的聽差生活，令唐寶臣大開眼界。他不僅見到了商賈雲集的繁榮，而且見到了英國人是如何靠強權和知識統治這塊土地的。他萌生了一個強烈的願望，那就是千方百計要讓兒子們到香港來讀書，然而其目的並不是要當商人，而是要像容閎的母親那樣讓兒子在英國商人手下當僕人，這種想法在當時的鄉人同胞中很普遍。他想出了一個出賣苦力的主意，即以給布朗當八年聽差作為條件來換取讓兩個稍大的兒子進入馬禮遜學校讀書。布朗深為這位樸實勤勞而富遠見的老農民作出如此驚人之舉而感動了，不僅欣然答應，而且很快就與之簽訂了長達八年的工役合同書。於是，唐寶臣兩個稍大的兒子進入了剛剛開辦不久的馬禮遜教會學校，成了布朗早期的中國學生，他倆就是1827年12月出生的長兄唐廷植和1832年2月出生的唐廷樞，一個年僅十五歲，一個年僅十歲。

在當時士大夫認為不可能的事，卻讓貧窮的唐家村民唐寶臣實現了，而且一送就是兩個親生骨肉，這真是馬禮遜學校的奇蹟。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唐寶臣帶着兩個兒子進入了馬禮遜學校，轉眼四年即逝。壽爾的《田鳧號航行記》載：“招商局現在的經理唐鏡心和他的一個兄弟，都是Brown醫生早期的學生。他們是Brown醫生的一個苦力的兒子，唐鏡心開頭在海關、以後在怡和洋行任職。據我所知，他是從怡和被找來經理招商局的。”(22)

壽爾在《田鳧號航行記》中說的Brown就是布朗，學校就是馬禮遜學校，招商局的唐鏡心，實際上就是唐廷樞，他號景星，亦作鏡心。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載：“予入校是在1841年，先我一年而入者已有五人，黃君勝、李君剛、周君文、唐君

傑與黃君寬也。”[23] 1848年，唐廷樞從馬禮遜教會學校畢業，1878年6月上海《遠東月報》載：“唐廷樞其早年教育，自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至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所受之於香港馬禮遜教會學校。”[24] 唐廷樞後來也自稱：“我曾經受過徹底的英華教育。”唐廷樞畢業時年僅十六歲，便開始當起了“僕人”。他在香港一家拍賣行當上了職位很低的助手，一幹就是三年；因為收入過於低廉，所以在1851年他十九歲時，到香港英人開設的巡理廳當翻譯；而到1858年被大伯樂李泰國[25] 發現擔任上海海關副大寫。這是唐廷樞第一次到達上海，成了他走向洋行買辦命運的轉捩點。此時的上海，正是中西互市的高峰期，各國商賈雲集滬上，中國商人也趨之若鶩，遂令上海灘空前發達起來。唐廷樞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來到上海的。

從1858年到1859年，唐廷樞在上海海關工作得非常出色，遂被提陞為正大寫及總翻譯。然而，微薄的薪水令他並不快活，所以到1861年，他一方面供職於上海海關，另一方面開始與英國怡和洋行發生接觸，代理該行長江一帶生意。怡和洋行[26]是沿用的習慣稱呼，它的實際名字是“渣甸－麥迪遜公司”（Jardine-Matheson and Co.）。唐廷樞在上海海關工作期間，與上海怡和洋行經理J．惠代爾（J. Whifall）日漸熟悉，加上他經常往返於上海與香港、漢口等口岸之間，代理一些攬載生意，實際是順理成章的事。

唐廷樞於1842-1848年接受了六年西式教育，1848-1851年在拍賣行當了三年助手，1851-1858年在香港殖民機構當了七年翻譯，1858-1861年又在上海海關擔任了三年高級翻譯，1861年離開海關在怡和洋行代理長江一帶生意，兩年後擔任買辦。這段時期對唐廷樞一生來說是積累和準備的二十年，其間他打下了深厚的知識基礎，積累了豐富的工作經驗，熟悉了許多國際規章制度，具體可歸納為幾個方面。

他通過自覺的刻苦學習，具備了深厚的語言和文化知識。容閎在《西學東漸記》中記載他在馬禮遜教會學校學習的科目時說：“校中教科，為初等之算術，地文及英文、國文。英文教課列在上午，國文教課則在下午。予惟英文一科，與其餘五人同時授課，讀音頗正確，進步亦速。”[27] 馬禮遜教會學校初設澳門，後遷香港，該校的教學與傳統的中國教學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不設中國的四書五經，而是英文、國文、算術、地文。這在當時的中國實屬新生事物，這些教學內容有利於學生接受西方的先進思想、科學技術。教學的目的也不同，宣稱教學不是為了謀取功名，而是學習有用的語言、算術、地文，可終生受用。特別是該校老師，全為美國名牌大學畢業生。最初主持校務者為勃郎先生。“先生美國人，1832年由耶路大學（Yale University）畢業，旋復得名譽博士學位，乃於是年（1839）2月19日偕其夫人蒞澳，以其生平經驗從事教育，實為中國創辦西塾之第一人。”[28] 第二位老師為火威廉麥克，“亦為耶路大學之畢業生”[29]。這些老師特別是啟蒙老師勃郎先生，不但學識淵博，而且教學經驗豐富。“未入耶路大學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經驗矣。故對於各種學生(……)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30] 所以馬禮遜學校培養的學生教學質量好。唐廷樞就是這種高素質、高水準的英語學校培養出來的高材生，加之他本人的秉賦，所以他在1848年離開馬禮遜學校時英語才華已非常引人注目，人們不僅稱贊他“英文寫得非常漂亮”[31]，“英文是這樣地精通”[32] 而且稱贊他“說起英語來像一個英國人”[33]。

唐廷樞在香港從事的翻譯生涯中，最突出的貢獻是1862年廣州緯經堂出版了他的《英語集全》，這是中國人自己編著的第一部英漢辭典。這部辭書共六卷，合464個單詞，內容包括天文、地理、日常生活、工商業、官制、國防等，第六卷中有一節為“買辦問答”，收入三百多個單詞。

唐廷樞在《英語集全》的序文中稱：“余幼時偶與二三友人到澳門一遊，將及澳，見官汛炮臺房屋，枕行傾倒，志其故，曰：為番人滋事所致。及抵澳，見蕃人樓臺廟宇宏壯可觀，其炮臺船隻堅固卻與內地不同。（……）洋務中人，多來問字，(……)因睹諸友不懂英語吃虧者有之，受人欺瞞者有之，或因不曉英語受人凌辱者有之(……)”[34] 其序文反映了唐廷樞早期就認識到要想順利與外國人

交往必須懂得外文和國際慣例用語。該書為當年學英語的人解決了不少困難，從中可窺見唐廷樞的品德學識和愛國情懷。

在香港殖民政府工作的十年中，他積累了大量的國際法律知識，特別是認清了帝國主義施諸中國人的那套不平等條約的伎倆。他在上海海關工作中，熟悉並經常運用大量海關法例、國際海關規章制度，為他以後嫻熟地運用這些條例去保護中國人的航運事業和保險事業打下了基礎。後來的許多事情得以證實這點。如1873年朱其昂購買的“拉普蒂克”（Laptek）輪船從英國抵達上海，唐廷樞和史柏丁到船上查看，看遍了船隻的各個部分，發現該船所列的90a級與實際不符，便拒絕接受這艘船隻，被對方製造廠家告上了法庭。唐廷樞勇敢出庭供證。他憑藉深厚的船舶知識和法律知識終於勝訴，拒絕接受這艘船。1873年8月，他從英國購買了一艘新船“和眾號”，後來證明它非常適宜於中國的沿海貿易。以後在收購美國旗昌輪船公司，兩次齊價合同等經濟外交中，唐廷樞均顯示了其知識的深厚功底和運用法律法規的靈活與機智，這對保護民族利益、維護民族權益，收回利權皆作出了重大貢獻。

【註】

（1）（2）Maggie Keswick (ed), *A Celebration of 150 Years of Jardine, Matheson & Co - The Thistle and the Jade,* 頁111。

（3）《捷報》，1892年10月14日，頁562。

（4）唐有淦：《唐家村村史》，珠海市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珠海市香洲區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聯合編印，1989年版，頁85-87。

（5）（6）《北華捷報》，上海，1892年10月7日。

（7）〈英國資產階級紡織利益集團與兩次鴉片戰爭的史料〉（下）《經濟研究》，1995年第2期。

（8）（9）彭澤益：《十九世紀後半期的中國財政與經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頁136；頁84-85。

（10）徐義生：《中國近代外債史統計資料》，中華書局，1962年版，頁58。

（11）唐姓，南宋寧宗皇帝年間自南雄南遷，經二世、三世、四世，至五世子英公居唐家，生六子，長廣禮，次廣達，五廣通，六廣潤，餘二房無嗣。

（12）（13）（14）（16）（17）唐步瀛：《子英房譜》，民國二十三年申戌春，現為私人珍藏。

（15）碑文保存於唐家三間廟聖堂廟。

（18）唐步瀛：《廣禮房譜》，民國二十年申戌春，現為私人珍藏。

（19）（20）（21）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頁67。

（22）壽爾：〈田鳧號航行記〉，中國史學會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8）》，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頁423。

（23）前揭容閎《西學東漸記》，頁73。

（24）〈遠東月報〉，1878年6月，前揭《洋務運動》（8），頁149。

（25）李泰國（1832-1898），英國人，1855年任上海江海關稅務司。1858年（咸豐八年）6月隨英法軍隊到天津，參予起草了《中英天津條約》，26日清朝欽差大臣桂良、花沙納與英國全權代表額爾金在天津正式簽訂，共五十六款，附有〈專條〉。主要內容：1）英國公使得駐北京，並在通商各口設領事官；增開牛莊、登州、臺灣（臺南）、潮州、瓊州、漢口、九江、南京、鎮江為通商口岸（後來開埠時，牛莊口岸設在營口、登州口岸設在煙臺、潮州口岸設在汕頭）；2）耶穌教、天主教士得以自由傳教；3）英國人得往內地遊歷、通商；4）英國商船可以在長江各口往來；5）中英兩國派員在上海舉行會議，修改關稅稅則；6）中國給英國賠款四百萬兩；（7）確定領事裁權和片面的最惠國待遇。1859年，李泰國出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自此作為中國主權象徵的海關和中國稅收主要來源的關稅，完全為英國列強所控制。

（26）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and Co.），成立於1832年，是一家老牌的英商企業，在中國和日本倒運鴉片、生絲、白銀、茶葉、煤炭等，是它在東南亞的主要經營項目，尤其是茶葉，是中國出口的最大宗貨物。在中國飲茶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直到16世紀末與17世紀初才傳入歐洲，逐步在荷蘭和葡萄牙流行起來，小量出口到英國，在倫敦的加拉維（Garraway）咖啡室和查爾斯二世布拉肯塞(Braganza)的凱塞琳宮殿，放入東印度公司老闆們的銀盃中。從1676年起，當康熙皇帝頒法令允許在廣州進行茶葉貿易到1834年英國政府中止《茶葉壟斷貿易法》為止，東印度公司一直是合法將茶葉輸入大英帝國的機構。1783年，輸入英國的茶葉共六百萬磅；1833年，該公司船隊首航澳州、雪梨（悉尼）運去大批茶葉；1834年，東印度公司委託該行一次將六百箱茶葉運往倫敦，每年自中國輸出茶葉達三億磅；同年由於英國政府中止了東印度公司的專利，使其他英商也獲得了銷售權，大肆從中國輸出茶葉，而在上海經營茶葉的華商除了與英國商人交易以後，也開始與其他國家的商人進行交易。

（27）（28）（29）（30）前揭容閎《西學東漸記》，頁73；頁75；頁75；頁74-75。

（31）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清華學報》1961年6月頁145，1864年9月27日，致J. 惠代爾的信。

（32）1864年9月27日，致J. 惠代爾的信，前揭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45。

（33）1873年1月6日上海瓊記洋行致香港瓊記洋行何德；前揭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

（34）前揭劉廣京〈唐廷樞之買辦時代〉，頁157。